

文革時期的「牛棚」之研究——

以季羨林為例

邱香怡*

摘要

1966 年 5 月 25 日聶元梓在北大寫了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造成當時的北大教授全部無一倖免的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季羨林（1911-2009），從原本加入造反派的井岡山到被打成右派，只因為他有三件東西：一把菜刀、一封裝著燒焦的舊信件、以及一張被畫了紅 X 的蔣介石和宋美齡的照片。這三件東西使他站上批鬥大會成為被批鬥的對象。從春初到 1968 年 5 月 3 日為批鬥、審訊加勞動階段。《牛棚雜憶》第十三章還寫到他們要自己搭建牛棚；文中也把整個被批鬥的過程、蹲牛棚經過，鉅細靡遺的敘述，偶爾戲謔似的嘲諷著此番悲痛遭遇，以及他差點到圓明園自殺的心路歷程，以至經歷批鬥之後，發覺自己還能忍受這等屈辱，決定好好活著的思想轉變；且幽幽憶述直到被釋放之後，長年存在精神上的匱乏感。

本文將從季羨林的回憶錄，佐以季承、楊絳、韓麗明、郝斌等人的回憶錄，進行研究「牛棚事件」—被關押之後，這些學術權威們如何度過無比艱苦的日子，以及探討牛棚的關押批鬥模式—探討他們被關押進牛棚的各自緣由，是筆者欲探究的問題；第二部分，本文嘗試處理牛棚在文革時期的歷史意義—梳理牛棚之於當事者到底是榮耀抑或苦痛，此部分將援引口述歷史的資料進行相關回憶錄的梳理。

關鍵字：季羨林、牛鬼蛇神、文革時期、牛棚、北大

*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活著」電影中，某段婦產科醫生被打成右派，關進牛棚的情節，促使筆者思考有關文革時期被形容成「反動學術權威者」、「反革命者」，背負這些被中國共產黨所羅織罪名的知識分子，有何相關的記述，且進一步探討他們的歷史記憶。

1956年，周恩來（1898-1976）作過關於知識分子的報告，曾經給知識分子極大的振奮，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的艱鉅任務，每一項工作越來越多地依靠科學、文化和技術，越來越多高級知識分子積極參與其中，在一場反右運動中，這群優秀的高中級知識分子，僅因給黨支部成員一點點善意的意見，便被打成右派，從此再也無法參加科研和教學活動，完全被剝奪了政治上的自由。1957年以後的知識分子的際遇，遠不如1956年以前了。¹

1966年6月1日刊載於《人民日報》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文章上記載著：「它號召群眾起來，『橫掃盤據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²再根據鄭謙的研究指出，在文革針對「科技人員就不要參加鍛鍊嗎？」³的質問，尖銳地批判說：「這樣提出問題的同志，實際上至今還不承認科技人員是勞動者。在他們頭腦深處有一種偏見，認為只有扛鋤頭、掄大錘才是勞動。因此他們看到科學技術人員專心致志地搞科技工作，就認為是脫離『勞動』。這是一種十分狹隘的思想。」⁴1968年8月，「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⁵誠如楊絳在《將飲茶》其中一篇〈丙午丁未年紀事——烏雲與金邊〉，開頭寫了偈子：

丙午丁未年的大事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舊社會過來的老知識分子不是「革命」的主要對象，尤其像我這種沒有名位也從不掌權的人，一般只不過陪挨著鬥罷了。這裏所記的是一個「陪鬥者」的經歷，僅僅是這

¹ 季羨林，〈我的心是一面鏡子〉，《春歸燕園》（吉林：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170。

² 馬繼深，《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8。

³ 鄭謙，〈五七干校述論〉，《中國：從「文革」走向改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205。

⁴ 鄭謙，〈五七干校述論〉，《中國：從「文革」走向改革》，頁205。

⁵ 鄭謙，〈五七干校述論〉，《中國：從「文革」走向改革》，頁241。

場「大革命」裏的小小側面。⁶

楊絳（1911-2016）⁷以陰曆的丙午年的六月影射 1966 年 8 月 9 日的文化大革命，形容自己只是大革命中的陪鬥者。文中敘述她與錢鍾書（默存，1910-1998）⁸被批鬥的過程，以散文的形式書寫。

在書寫此文之前，先以日記、回憶錄、中國的文革網路資料作為本文主要的參考研究取徑，針對文革時期的「牛棚」回顧，以季羨林（1911-2009）的《牛棚雜憶》⁹為中心，從原本他加入造反派的井岡山到他被打成右派，只因為他有三件東西：「一是晃晃一把菜刀；一是裝著燒焦的舊信件；一是畫了紅 X 的蔣介石和宋美齡的照片。」¹⁰，因這三件東西，他站上批鬥大會被批鬥。從春初到 1968 年 5 月 3 日為批鬥、審訊加勞動階段。¹¹第十三章還寫到他們要自己搭建牛棚；文中對於整段被批鬥過程、蹲牛棚經過，有著鉅細靡遺的敘述，偶爾戲謔似的嘲諷著自己的悲痛遭遇，以及差點自殺的心路歷程，以至經歷批鬥過後，決意不死，要好好活著的思想轉變。根據王友琴的研究成果指出，針對打老師之風氣，從 1966 年 8 月 20 日左右開始蔓延，「打人風從北京的學校蔓延到社會，被打的人從老師擴大到各種人：『地、富、反、壞、右』、演員、作家、民主黨派成員，以及共產黨的各級當權派。同時，『大串連』把打人風氣帶到全國」。¹²

「牛棚」一詞，根據王友琴的《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受難總論（下）》此文

⁶ 楊絳，〈丙午丁未年紀事——烏雲與金邊〉，收錄於《將飲茶》（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7 年），頁 126。

⁷ 楊絳，本名楊季康，祖籍江蘇無錫，生於北京。1932 年畢業於蘇州東吳大學。1935 年與錢鍾書結婚，同年兩人至英國留學。1937 年轉赴法國。1938 年夫婦倆攜女返國，回國後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清華大學任教。1949 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喜劇著有《稱心如意》、《弄假成真》；文革後著有《幹校六記》、《洗澡》、《將飲茶》、《我們仨》；翻譯著有《堂吉訶德》、《斐多》、《小癩子》等文學作品。資料來源：《幹校六記》，封面頁。

⁸ 錢鍾書，原名仰先，字哲良，後改名鍾書，字默存，號槐聚，曾用筆名中書君，男，江蘇無錫人，中國作家、文學研究家，亦是出生於吳越錢氏家族。曉暢多種外文，包括英、法、德語，亦懂拉丁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等。作家、詩人兼講座教授余光中分析當代中文時，常稱道錢西學列於中國人之第一流。資料來源：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8C%A2%E9%8D%BE%E6%9B%B8>。引用時間：2024 年 1 月 10 日。

⁹ 季羨林，《牛棚雜憶》（香港：三聯書店，1999 年）。

¹⁰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 81。

¹¹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 83。

¹² 王友琴，〈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收錄於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集刊（三）》（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6 年），頁 32。

中說：

1968 年，全中國每個工作單位都建立了監獄，關押各單位的工作人員。官方名稱叫做「隔離審查」。後來被叫做「牛棚」。因為被關押在「牛棚」裡的人是「牛鬼蛇神」。我檢索文革時代留下來的文字資料，看到在官方檔案中最早使用「牛棚」一詞的，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時間是 1968 年。

13

本文將以季羨林(1911-2009)的回憶錄，佐以其他相關回憶錄，進行研究「牛棚事件」—從知識菁英到階下囚，他們如何忍辱度過，並進一步探討牛棚的關押批鬥模式—探討他們被關押進牛棚的各自緣由，第二部分，本文嘗試處理牛棚在文革時期的歷史意義—梳理牛棚之於當事者到底是榮耀抑或苦痛，此部分將援引口述歷史的資料進行相關回憶錄的梳理。

二、季羨林在北大從批鬥會到牛棚的心路轉折

根據韓麗明在回憶錄中解釋「牛棚」的意思，他說：「文化大革命時期，有很多老幹部、知識分子以及無辜的群眾遭到迫害，被強迫加上『走資派』¹⁴『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分子』、『叛徒』、『特務』等莫須有罪名，這些人被統稱為『牛鬼蛇神』。」¹⁵

(一) 季羨林的生平

季羨林，1911 年 8 月 6 日出生於山東省清平縣人（現歸臨清市），是山東有名的貧困地區，字希逋，又字齊奘，1934 年畢業於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研習莎士比亞、歌德、塞萬提斯等西洋文學名家。翌年赴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巴

¹³ 王友琴，《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受難總論（下）》，收錄於《傳記文學》（第 117 卷，第 3 期），頁 81。

¹⁴ 「走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簡稱，是對黨內客觀情況錯誤判斷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錯誤概念。1965 年 1 月，中共中央制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966 年 8 月《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規定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錯誤被林彪、江青等人所利用。1981 年 6 月，第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資派」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幹部，即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幹力量。廣州地區軍隊院校協作中共黨史組，《中共黨史學習手冊》，（廣州：廣州中共黨史組，1984 年），頁 208。引用日期：2023 年 11 月 1 日。

¹⁵ 韓麗明，《牆縫裡的秘密：文革謬事拾遺（上）、（下）》（臺北：釀出版，2014 年），頁 17。

利文、吐火羅文，結識留學生章用、田德望等，遭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獲哲學博士學位。1946 年回國，在北京大學東方語言系任教授。1956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與反右運動，批判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初期，1967 年曾參加周培源主導的造反派組織井岡山兵團，反對聶元梓派，在政治鬥爭中失利，被列為反革命，下放牛棚，遭受迫害。1973 年開始翻譯印度史詩《羅摩衍那》，1977 年完成全譯本。

16

（二）從抄家、批鬥會、勞改到牛棚

1967 年 11 月 30 日深夜被革命小將抄家，一家三口被趕到廚房裡，「桌子、椅子，只要能打翻的東西，都打翻了，看著辛辛苦苦幾十年的積累起來的科研資料，一半被擄走，一半散落在地上。」¹⁷翌日，季羨林騎著自行車要去井岡山總部，「走在路上，北大所有的高音喇叭都放開了，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打倒季羨林！』歷數我的「罪行」。¹⁸到了井岡山總部，一方面派攝影機到我家進行現場拍攝；另一方面他們已經決定調查我的歷史，必要時把我拋出來，甩掉這個包袱，免得受到連累，不利於同新北大公社的鬥爭。」¹⁹季羨林這段敘述顯現出，他到後來才知道井岡山要拋棄他的事實。

在審訊過程中，季羨林交代那三個罪證：

第一個是一隻竹籃子，裡面裝著燒掉一半的一些信件，因為他從原本住的四間房子，給樓下我的一位老友上來住，……房子就減了一間半，積存的信件太多，因此想燒掉一些。第二個罪證是一把菜刀，是抄家時從住在另一間房間裏我姨母枕頭下搜出來的。第三個罪證是一張石印的蔣介石和宋美齡的照片。這是在德國哥廷根時一個可能是三青團員或藍衣社分子的姓張的「留學生」送給我的。我對蔣介石的態度，除了一段時間不明真相，從 1932 年南京請願一直到今天，從來沒有好過。²⁰

可見當時的季羨林，證據確鑿，百口莫辯。根據季羨林的兒子季承講述文革災難

¹⁶ 季羨林，〈第九章千鈞一髮〉，《牛棚雜憶》，頁 239-258。

¹⁷ 季羨林，〈第七章抄家〉，《牛棚雜憶》，頁 55。

¹⁸ 季羨林，〈第七章抄家〉，《牛棚雜憶》，頁 55。

¹⁹ 季羨林，〈第七章抄家〉，《牛棚雜憶》，頁 55。

²⁰ 季羨林，〈第七章抄家〉，《牛棚雜憶》，頁 61。

的第一個罪證是他與叔祖母，想把他父親的舊信件給焚燒，他在樓後面焚燒時，恰巧一群紅衛兵經過，過來詢問之後，把火熄滅，並把未燒完的信件拿走。²¹而第二個罪證，一把菜刀，季承述說著，因北大抄家的恐怖氣氛，致使叔祖母把廚房的菜刀拿去放在枕頭下，這又歸到父親頭上，紅衛兵來抄家時，就說這把菜刀是季羨林拿來要謀殺紅衛兵的。²²第三個罪證是紅衛兵又從焚燒的信件中看到蔣介石的照片，那是父親德國留學時，大使館贈送的。²³

根據季羨林的兒子季承的文革回憶說：

有一次我回去，正好碰到父親被放回家準備參加下午的批鬥大會。所謂準備，就是要自製一塊大牌子，上面寫上自己的姓名和身分，例如：「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等，再用紅筆在自己的姓名上打上個大叉子。姓名要倒著寫，表示反動並且已被打倒。他見我來，就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我如法炮製，只是在掛的繩子上做了點小手腳，選了根稍粗一點的繩子，以免脖子吃虧。²⁴

由此回憶錄得知，批鬥場上那一大塊掛在脖子的牌子是要自己製造的，並且還要寫上污辱自己的字眼，好讓紅衛兵們開心。

根據《牛棚雜憶》中季羨林被批鬥的現場：

我想到魯迅的小說：《示眾》，我現在就是那個被示眾者，我周圍必然有一大群像小說中所說的觀眾。不知道是怎樣一來，我就被押解到一個地方，我知道這是大飯廳。²⁵我驀地聽到空中一聲斷喝，像一聲霹靂：「把季羨林押上來！」於是走上來了兩個紅衛兵，一個抓住我的右臂，擰在我的背上。一個抓住左臂，也擰在我的背上。同時，一個人騰出來一隻手，重重地壓在我的脖頸上，不讓我抬頭。我就這樣被押上了批鬥台，又踉踉蹌蹌地被推搡到台的左前方。「彎腰」好，我就彎腰。「低頭」，好，我就低頭。但是脊樑上又重重握了拳：「往下彎！」好，我就往下彎。可腿上又兇猛地

²¹ 季承，〈「文革」災難〉，《我和父親季羨林》（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頁84。

²² 季承，〈「文革」災難〉，《我和父親季羨林》，頁84-85。

²³ 季承，〈「文革」災難〉，《我和父親季羨林》，頁84。

²⁴ 季承，〈「文革」災難〉，《我和父親季羨林》，頁86。

²⁵ 季羨林，〈第九章千鈞一髮〉，《牛棚雜憶》，頁74。

被踢了一腳：「再往下彎」好，我就再往下彎。我站不住了，雙手扶在膝蓋上。立刻又挨了一拳，還被踢了一腳：「不許用手扶膝蓋！」此時雙手懸在空中，全身的重力都壓到了雙腿上，腿真有點承受不住了啦。「革命小將」按照噴氣式飛機的構造情況，要我變成那個樣子。²⁶

由這個回憶錄中，知道季羨林被施以「噴氣式飛機」的刑罰，其實這個刑罰後來都套用在被批鬥的人身上，例如臺灣共產黨領導人謝雪紅也遭遇過此等刑罰。季羨林卻對這個刑罰致敬，他說：「我必須向發明者奉獻出我最大的敬意，他們精通科學技術，懂得「噴氣式飛機」的構造原理，才發明了噴氣式的批鬥法。這種方法禽獸們是想不出來的。」²⁷季羨林這時的語氣帶有嘲諷的意味存在。

1968年5月4日，五四運動的紀念日，中國規定的青年節，這一批囚徒被壓解到了煤廠。以下為回憶錄的記載：

我仔細看了一下，不是所有的囚徒，而是「擇優錄取」，或是「優化組合」，選了一批特別「罪大惡極」的。其中有「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點了名的陸平和彭珮雲等等。我們每一個人的脖子上都被戴上了一塊十幾斤重的大木板，上面寫著自己的名字。我們被命令坐在地上，誰也不敢出聲。²⁸

這邊季羨林一樣講的是聶元梓在大字報寫的那三位人士中其中兩位「黑幫」，並且以「罪大惡極」形容他們這群「牛鬼蛇神」。

季羨林被批鬥過後又回到學校，並且自己修建牛棚，住進去，以下這段是詳細記載修建牛棚的過程：

我們這一群黑幫就被召到外文樓和民主樓後面的三排平房那裡去，自己動手，修建牛棚，然後再請君入甕，自己住進去。我也曾在這裡上過課，房子都是簡陋到不能再簡陋的程度。屋頂極薄，擋不住夏天的炎陽。窗子破舊，有的缺少玻璃，阻不住冬天的寒氣。

然而今天北大公社的頭子們卻偏偏選中了這塊地方當做牛棚，把我們關在這裡。牛棚的規模是，東面以民主樓為屏障，南面以外文樓為屏障，北面

²⁶ 季羨林，〈第九章千鈞一髮〉，《牛棚雜憶》，頁75-76。

²⁷ 季羨林，〈第九章千鈞一髮〉，《牛棚雜憶》，頁79-80。

²⁸ 季羨林，〈第十一章大批鬥〉，《牛棚雜憶》，頁101。

沒有建築的地方，都用葦蓆搭成牆壁，遮了起來。在外文樓與民主樓之間的空闊處，也用葦蓆圍起，建成牛棚的大門。我們這一群「牛」們，被分配住在平房裡，男女分居，每屋 20 人左右，每個人只有躺下能容身之地。因為久已荒廢，地上濕氣霉味直衝鼻官。後來老佛爺（聶元梓）天恩，運來一批木板，可以鋪在地上擋住濕氣。後門內外設置了很多防護措施，還有鐵蒺藜之類的東西，長矛當然不能少。

在西邊緊靠女牢房的地方搭了一座蓆棚，原名叫外調室，後來他們覺得這不夠「革命」，改名為審訊室。在外文樓後面搭了一座大蓆棚，後來供囚犯們吃飯之用。²⁹

由此紀錄得知牛棚的規模有一定的模式與組織，首先先選地方，又是牛鬼蛇神以前熟悉的地方，然後又慎防他們逃走，還在外設置護欄之類的柵欄、另有審訊室與吃飯的地方。僅以葦蓆作為搭建牛棚的材料，這跟臺灣早期農村使用的蘆葦桿製作牆壁一樣。

根據季羨林對北大的兩派的武鬥記憶，從 1967 年冬天到 1968 年春天：

此時，北大的兩派早已開始了武鬥。兩派都創建了自己的兵工廠，都有自己的武鬥隊。兵器我在上面已經提到一點。掌權的公社派當然會闊氣非凡。他們把好好的價值昂貴的鋼管鋸斷，磨尖，形成了長矛，拿在手裏，威風凜凜。井岡山物資條件差一點，但也拚湊了一些武器。每一派各據幾座樓，相互鬥爭。每一座樓都像一座堡壘，警衛森嚴。我沒有資格親眼看到兩派的武鬥場面。……但是，真正的武鬥，只要有可能，我還是盡量躲開的。

30

再根據郝斌的文革回憶：

1968 年秋，……兩個月以前，對立的兩派「新北大」和「井岡山」又一次武力相見，其規模和水平更遠在春季武鬥之上。雙方有攻有守，斷水、斷電，反斷水、反斷電，鬥起法來，科技含量頗高。兩座學生宿舍之間，四層樓上架設天橋，兩樓之間挖了地道，這些痕跡，當時隨處可見。學生宿

²⁹ 季羨林，〈第十三章自己親手搭起牛棚〉，《牛棚雜憶》，頁 113-114。

³⁰ 季羨林，〈第十章勞改的初級階段〉，《牛棚雜憶》，頁 95。

舍 29 樓一層南側的門窗，被木板釘得嚴嚴實實，這是防禦性工事；37 樓樓頂斑斑駁駁，許多屋瓦被揭下，用到彈弓上當了子彈，百米之外的地面上，還散落著屋瓦的碎片，這是攻擊型武器。³¹

由以上兩段季羨林與郝斌對 1968 年北京大學的兩大派「新北大」與「井岡山」的武鬥場面的回憶來看，可以知道那時兩方互相爭鬥不休，致使北大校園槍林彈雨。季羨林說：「我被監工頭領到學生宿舍區去清理一場激烈的武鬥留下的戰場。……我們的任務就是來清楚這些垃圾。」³²郝斌就說：「校園裡等著我們去收拾的活兒，永遠幹不完。」³³可見當時戰況激烈，還要勞改的他們去清掃整理被弄亂的環境。據王友琴的研究指出：「當時建立勞改隊，又稱『專攻隊』、『牛鬼蛇神隊』。被打入此隊的老師要在烈日下幹髒重活兒、掃廁所、掃街等等」。³⁴

綜觀以上的回憶錄，呈現出北京大學這次「聶元梓貼大字報」的批鬥事件，延燒到兩大派，「新北大公社」和「井岡山」的派系鬥爭，季羨林選擇加入井岡山派，但最後組織卻又拋棄他，跟新北大公社一同批鬥他，他也由抄家、批鬥會、勞改到牛棚，逐一經歷整個過程，對人性是愈趨於冷淡、不信任，精神上已死。

三、「牛棚」在文革時期的歷史意義與烙印在當事者心中的痕跡

「牛棚」關押者基本上都是學術權威、知識分子、醫生等類的人。根據季羨林對「牛棚」的形容，他說：「在北大，我們這裡的『官方』叫做『勞改大院』，有時通俗化稱之為『黑幫大院』，他們是專在暗中幹『壞事』的，是同『革命司令部』唱反調的。這一幫家伙被關押的地方就叫做『黑幫大院』。」³⁵

（一）文革時期的牛棚

彭麗君在《文革中的幽靈：作為「牛鬼蛇神」的知識份子》指出：「文革得

³¹ 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臺北：大塊文化，2014 年），頁 177-178。

³² 季羨林，〈第十章勞改的初級階段〉，《牛棚雜憶》，頁 95。

³³ 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頁 178。

³⁴ 王友琴，〈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收錄於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集刊（三）》，頁 24。

³⁵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 1。

以蓄積和發放如此巨大的政治能量，很大程度源於人民和毛澤東結盟，互相賦於對方的權利。」³⁶

表 1：進牛棚的步驟

進牛棚前的批鬥模式	舉例
1.貼大字報	例如：1966 年 5 月 25 日聶元梓在北大寫了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
2.批鬥會	例如：陶鈍的《一個知識分子的自述》一文中寫著：鬥爭對象脖子掛著牌子，上面寫著自己單位和自己的名字，排成一列，跪在台上，每人後面站著兩個護衛。鬥爭對象一個一個地舉起牌子，講述自己所在的單位和自己的罪行。 ³⁷
3. 示眾	按時敲鑼，「黑幫」帶著牌子上平台，也是一字兒擺開，從一頭開始雙手舉牌子高過頭頂，頭往下低，幾乎要夾到兩腿中間了，每人按順序報叫什麼名字、那個單位的、擔任什麼工作職務，名聲越大的人，停的時間就越長，我不是知名人士。開始時，一天兩次，後來增加到四次，樓外街道上來參觀的人很多，我們的家屬、朋友和鄰居也來悄悄看我們，後來，鑼聲敲過，人數越來越少，直到繼續不下去了示眾才停止。 ³⁸
4.勞改	根據井岡山 06 教工的這篇《看聶孫之流是怎樣殘酷打擊歷史系一大片幹部和教員的——記歷史系「勞改隊」在太平莊的前前後後》一文中指出：監督小組負責人宣佈了如下的命令：

³⁶ 彭麗君，《文革中的幽靈：作為「牛鬼蛇神」的知識份子》，《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6 年 10 月號，總第 157 期），頁 101。

³⁷ 陶鈍，《一個知識分子的自述》，（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610。

³⁸ 陶鈍，《一個知識分子的自述》，頁 611。

	1. 平時不許交談，只在星期六才許交談一次勞改心得； 2. 在勞改中必須相互監視和揭發； 3. 不准隨便離開住所，到鄰近的村莊合作社買東西也必須請假並有兩人同行； 4. 每一二天必須上交思想彙報。³⁹
5. 蹲牛棚	陶鈍的〈遷戲校蹲牛棚〉，他們把所有的管點事的幹部和懂點京劇藝術的教師都關進牛棚，約有 40 餘人。⁴⁰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陶鈍，《一個知識分子的自述》，（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7 年）。

從表 1 中得知，進牛棚的順序中，首先貼大字報的部分，就開始進行言語攻擊。接著被抓去「批鬥會」，每次批鬥大會現場都會有當事者認識的人，以至於你的學生。示眾的部分，把牌子舉高，還要報上自己的單位與姓名，每天都有人來觀看，家屬也是。勞改的部分，以不准交談、互相監視與揭發對方、思想彙報為原則。蹲牛棚的部分，陶鈍的幹部和教京劇藝術的教師們通通被關進牛棚裡。如同北大的知識份子的歷史系的教授們。而季羨林於「我們的住處」敘述：「低矮潮濕，霉氣撲鼻。此地有老鼠、壁虎，大概也有蠍子。」⁴¹顯而易見，牛棚的生活環境不會太好，能有睡覺的地方就不錯了。針對紅衛兵的打法，王友琴指出：「還有用帶銅頭的皮帶抽、剃陰陽頭、唱『嚎歌』⁴²，又叫『牛鬼蛇神歌』，因為他們不被當人，所以不是唱是『嚎』」。⁴³

根據楊絳回憶文革時被關押時的記載：

³⁹ 井岡山 06 教工，《看聶孫之流是怎樣殘酷打擊歷史系一大片幹部和教員的——記歷史系「勞改隊」在太平莊的前前後後》，收錄於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頁 226。

⁴⁰ 陶鈍，《一個知識分子的自述》，頁 621。

⁴¹ 季羨林，〈第十四章牛棚生活（一）〉，《牛棚雜憶》，頁 121。

⁴² 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對人民有罪，人民對我專政、我要低頭認罪、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我要是亂說亂動，把我砸爛砸碎，把我砸爛砸碎」。資料來源：王友琴，〈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收錄於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集刊（三）》，頁 24。

⁴³ 王友琴，〈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收錄於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集刊（三）》，頁 24。

宿舍大院的平房裏忽出現一個十六七歲的紅衛兵。他星期日召集大樓裏的「牛鬼蛇神」去訓話，下令每天清早上班之前，掃大院、清除垃圾，還附帶一連串的禁令：不許喝牛奶、不許吃魚、吃肉、吃雞蛋，只許吃窩窩頭、鹹菜和土豆。當時已經有許多禁令，也不知是誰制定的，如不准戴草帽、不准撐陽傘、不准穿皮鞋等等。我們這群「牛鬼蛇神」是最馴良、最和順的罪犯，不論誰的命令都一一奉行。因為一經「揪出」，就不在人民群眾之中，而在人民群眾之外，如果抗不受命，就是公然與人民為敵，「自絕於人民」。⁴⁴

從以上回憶錄顯示，當時針對牛鬼蛇神的禁令一堆，普遍吃得不好，只能吃一些窩窩頭、鹹菜和土豆的五穀雜糧之類的飯菜。就是把一切知識分子高貴的象徵，都要杜絕，例如以上所述不能戴草帽、撐陽傘、穿皮鞋；一旦被揪出來，抗命就是與人民為敵，所以只能乖乖服從命令。

（二）進入牛棚之於當事者是榮耀還是苦痛

根據彭麗君的研究指出：「沒有知識份子作為待罪羔羊，就沒有文革；而最吊詭的是，知識份子本身就是這個論述的建構者之一。」⁴⁵

1967年，季羨林進入牛棚之前的一連串的抄家、審訊，遭遇到被所收的弟子背叛、凌虐，這時的季羨林有了自殺的念頭：

最讓我難以忍受的是我的兩個「及門弟子」。其中之一是貧下中農出身又是「烈屬」的人，簡直是紅得不能再紅了。學習不怎麼樣。我為了貫徹所謂「階級路線」，硬是把他留下當了我的助教。還有同他像是棗木球一對」的資質低劣，一直到畢業也沒有進入梵文之門。……，我在課堂上給他吃偏泛，多向他提問。「可憐天下老師心」，到了此時，我成了「階級報復」者。就是這兩個在山（井岡山）上的人，把我揪去審訊，口出惡言，……他們竟動手動腳，擰我耳朵。……我的前途要比我看到的被批鬥的走資派更無希望。我何去何從？我必須做出抉擇。抉擇的道路只有兩條：一是忍

⁴⁴ 楊絳，〈丙午丁未年紀事——烏雲與金邊〉，收錄於《將飲茶》（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7年），頁131。

⁴⁵ 彭麗君，〈文革中的幽靈：作為「牛鬼蛇神」的知識份子〉，《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6年10月號，總第157期），頁101。

受一切，一是離開這一切，離開這個世界。第一條我絕對辦不到的；看來只有走第二條道路一途了。⁴⁶

從引文中可發現季羨林受不了他帶出來的學生，竟然批鬥他，也呈現出他寧死不屈的精神。文中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死、怎麼死，要投湖還是在家用安眠藥自殺。當時不是所有老師都被打，根據王友琴的研究成果指出，被打的主要有三種人：

第一是學校負責人。比如，上面寫到的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的『八五』慘案，除了一名管總務的副校長和一名總務主任外，其他五名校級負責人都被毒打，罪名是『反革命黑幫』；第二是業務強、有經驗、教書教得好的教師，當時被說成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第三是個人歷史或家庭出身『有問題』的，1957年『反右』時被定了甚麼的老師，儘管事實上文革前的多次政治運動，已經清洗了教師的隊伍。⁴⁷

季羨林正準備拿著裝著安眠藥的袋子要去死，紅衛兵再度光臨，季羨林被頭一次的批鬥。⁴⁸他說：

這是我活了五十多年第一次受到的批鬥，牠著實能令人驚心動魄，畢生難忘。牠把人的殘酷的本性暴露無遺。然而牠卻在千鈞一髮之際救了我一條命。「這樣殘酷的批鬥原來可以忍受得住的呀！」我心裏想。「有此一鬥，以後還有什麼可怕的呢？還是活下去吧！」⁴⁹

這段敘述反映季羨林由起初的意圖自殺，對人性絕望，到捱過批鬥，決意活下去的思想轉變，可謂峰迴路轉只在瞬刻。

誠如王友琴的研究指出：

從牛棚的分佈和密度，就可以知道文革中被關進「牛棚」的人數量巨大。那一時期發生的大量死亡和「牛棚」緊密相關。在此期間，大批被迫害的人「自殺」了。在北京大學，從1968年9月到12月，有二十三名「運動

⁴⁶ 季羨林，〈第八章在「自絕於人民」的邊緣上〉，《牛棚雜憶》，頁63-65。

⁴⁷ 王友琴，〈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收錄於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集刊（三）》，頁25。

⁴⁸ 季羨林，〈第九章千鈞一髮〉，《牛棚雜憶》，頁72-73。

⁴⁹ 季羨林，〈第九章千鈞一髮〉，《牛棚雜憶》，頁78。

物件」死了。都被宣佈為「自殺」。還有一些人，在被關押的情況下被打死的，看守者慌稱他們「自殺」。……有三十一名「清理物件」死亡，其中一名被打死，其他三十名都記載成「自殺」。⁵⁰

由資料上顯示，當時選擇自殺的人不少，但被迫害，而造成不自然的死亡狀態眾多，顯然中國官方卻記載成「自殺」，加以隱蔽責任歸屬，全推給已死亡的人去概括承受，死無對證，更可讓中國共產黨羅列出更多罪名。根據張允若的這篇〈文革中自殺的部分知識精英名錄〉⁵¹的統計，名單上有黃紹竑（1895-1966）⁵²、何基（1916-1966）⁵³、翦伯贊（1898-1968）⁵⁴等文革時期知識分子，本文只列舉三名，據張允若的統計的是 105 人，乃因文革而造成死亡，而他也統計文革受難者被迫害致死，大致有三種：「一是直接被毆打、槍殺、折磨致死的，一是毆打折磨后得病而死的，另一是毆打折磨后憤而自盡的。」⁵⁵他在文中亦說明了要具體查出死亡的原因，須從回憶錄著手，但有的記載不明確，需要再做比對分析。誠如郝斌在自傳中說：「『文革』期間，北京大學教職員工和學生中所謂『非正常死亡者』，包括受逼、受辱不過，以各種方式抗爭自戕者，被用拳腳和各種刑具活

⁵⁰ 王友琴，〈三、1968-1969 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自殺」和他殺〉，《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受難總論（下）》，收錄於《傳記文學》（第 117 卷，第 3 期），頁 81。

⁵¹ 張允若，〈文革中自殺的部分知識精英名錄〉（2013 年 6 月 17 日）。資料來源：「禁聞網」，<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lishi/20130831/661597.html>。引用時間：2024 年 1 月 11 日。

⁵² 黃紹竑：1895 年生，廣西容縣人。愛國將領和民主人士。曾參加辛亥革命、北伐戰爭、抗日戰爭及國共和談。建國后曾任政務院政務委員、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常委等職。文革中遭迫害，1966 年 8 月 31 日自殺。資料來源：張允若，〈文革中自殺的部分知識精英名錄〉（2013 年 6 月 17 日）。「禁聞網」，<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lishi/20130831/661597.html>。引用時間：2024 年 1 月 11 日。

⁵³ 何基：1916 年生，江西師範學院歷史系教授。1966 年 8 月 11 日，在學校大規模「游斗」教師時遭到殘酷折磨和侮辱。當晚他自殺身亡。該校當天另有三人在「游斗」過程中被折磨毆打而死亡。資料來源：張允若，〈文革中自殺的部分知識精英名錄〉（2013 年 6 月 17 日）。「禁聞網」，<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lishi/20130831/661597.html>。引用時間：2024 年 1 月 11 日。

⁵⁴ 翦伯贊：1899 年生，湖南桃源人。維吾爾族。著名歷史學家。有《中國史綱》等十八部著作行世。1937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後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學報》主編等職。文革中被反覆批鬥逼供、要他寫材料誣陷劉少奇，於 1968 年 12 月 18 日偕妻戴淑宛雙雙服藥自殺。資料來源：張允若，〈文革中自殺的部分知識精英名錄〉（2013 年 6 月 17 日）。「禁聞網」，<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lishi/20130831/661597.html>。引用時間：2024 年 1 月 11 日。

⁵⁵ 張允若，〈文革中自殺的部分知識精英名錄〉（2013 年 6 月 17 日）。「禁聞網」，<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lishi/20130831/661597.html>。引用時間：2024 年 1 月 11 日。

活打死者，共有 63 名之多，我的老師汪錢（1916-1966）⁵⁶是頭一名。」⁵⁷顯示當時還有 62 名不知名的「非正常死亡者」，郝斌也說，他老師都還沒進入「牛棚」，就已走了。根據《百年真相》報導：「1966 年 6 月 10 日，北京大學最年輕的文科教授之一汪錢，在北大朗潤園十公寓的家中服殺蟲劑「敵敵畏」自殺，年僅 50 歲。」⁵⁸

季羨林被從「牛棚」放出來之後，有一段時間成了地地道道的「中間人物」，他掃過廁所、掏過大糞、看過電話、守過門房，生活介於人與非人之間、革命與反革命之間、黨員與非黨員之間、人民與非人民之間。⁵⁹根據季羨林的口述：

我的確活下來了。然而，在剛離開「牛棚」的時候，我已經雖生猶死，我成了一個半白癡，到商店去買東西，不知道怎要說話。讓我抬起頭來走路，我覺得不習慣。耳邊不再響起「媽的！」、「混蛋」、「王八蛋！」一類的詞兒，我絕奇怪。見了人，我是口欲張而囁嚅，足欲行而趑趄。我幾乎成了一具行屍走肉，我已經「異化」為「非人」。⁶⁰

此段回憶錄呈現出季羨林對他遭遇的一切，雖然身體還在，但是精神上是死亡的狀態，離開牛棚之後，如行屍走肉般地活著。再以北大的郝斌為例，他描述道被送進「牛棚」的日子：

所謂「匯報人」，就是飯前「請罪」的時候，他先單口一聲：「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們「牛鬼蛇神」一眾趕緊齊聲跟喊：「請罪！」並按隊列順序逐個報出自己的「帽子」和姓名，如我就是：「現行反革命分子郝斌」；周一良先生的「帽子」有五項，要喊得一個不漏，喊的時候還要彎腰低頭。謝有實的腰最早彎下來，等到我們一個一個喊完，大家才一塊直起腰來，

⁵⁶ 汪錢：1916 年生於江蘇揚州，1934 年考入清華大學歷史系。在當年清華 300 多名新生中，他的入學成績總分名列第二，而且數學獨得滿分 100 分。1939 年，汪錢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做研究生，師從陳寅恪，地點在昆明西南聯大。《百年真相》，〈北大教授汪錢為何被逐出師門？〉，<https://cn.epochtimes.com/b5/23/4/26/n13982277.htm>。引用時間：2024 年 4 月 19 日。

⁵⁷ 郝斌，〈「牛棚」之外的「牛鬼蛇神」〉，《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頁 42。

⁵⁸ 《百年真相》，〈北大教授汪錢為何被逐出師門？〉，<https://cn.epochtimes.com/b5/23/4/26/n13982277.htm>。引用時間：2024 年 4 月 19 日。

⁵⁹ 蔡德貴，《東方學人季羨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236。

⁶⁰ 季羨林，〈我的心是一面鏡子〉，《東方》（1994 年第 5 期）。

這樣一算，謝有實彎腰低頭的時候最長。⁶¹

以上這段是他敘述著，他與同行被關押者被當牛鬼蛇神的過程，所以他經歷過牛棚事件之後，便不再回去北大，對於他來說那是一個苦痛的記憶。

綜觀以上受難者的遭遇，不難發現，即使已被放出牛棚，但精神上的恢復還是無法快速銜接上社會，他們歷經長期的霸凌、欺辱、無自尊的踐踏，因而產生了心理疾病。短時間內要重建，需要一段漫長的過程。

三、 結論

季羨林的《牛棚雜憶》⁶²述說著北京大學的「聶元梓貼了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於焉展開北大的文革階段，這兩本著作的敘事基本上還是圍繞著被批鬥者的無奈與無法理解的政治關係，以及其中錯綜複雜的派系鬥爭（井岡山兵團和北大公社聶元梓派），映現共產黨政權下打壓知識菁英之一亂象——知識分子在文革時代是不值錢的，會被罵「臭知識分子」⁶³，連身為紅衛兵的知識份子也不例外。

從季羨林的回憶錄中，呈現出北京大學這次「聶元梓貼大字報」的批鬥事件，延燒到兩大派，「新北大公社」和「井岡山」的派系鬥爭，而季羨林卻選擇加入井岡山派，但最後組織卻又拋棄他，跟新北大公社一同批鬥他，他也由抄家、批鬥會、勞改到牛棚，逐一經歷整個過程，對人性是愈趨於冷淡、不信任，精神上已死。

季羨林在《牛棚雜憶》⁶⁴中記述，剛開始他在批鬥過後，也有想過去圓明園自我了斷，但在一次又一次的批鬥過後，他還能獨自走回家，家人看到他還能活著回來，都很開心。文中，季羨林以佛教的十八層地獄去形容牛棚的批鬥生活，以超然的概念去形塑牛棚裡的日子是水深火熱的，他經歷過大大小小的批鬥與遊行示眾，到最後已成了麻木不仁的狀態：「……對我產生了什麼結果呢？除了感覺

⁶¹ 郝斌，〈人道的用刑？用刑的人道？〉，《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頁151-152。

⁶² 季羨林，《牛棚雜憶》。

⁶³ 1969年3月22日，「這些人也太左了，動不動就罵我們是臭知識分子，動不動就說我們工人階級的拳頭是不吃素的！」林紅興高采烈地說。陳煥仁，《紅衛兵日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646。

⁶⁴ 季羨林，《牛棚雜憶》。

到有點疲倦之外，『虱子多了不癢』，我『被批鬥的積極性』反而調動起來了。我愛上了這種批鬥。我覺得非常開心，你那裡『義正詞嚴』，我這裡關上耳朵，鎮定養神，我反而是『以逸待勞』了。」⁶⁵這就是金剛經裡形容的「無我相」，再多的批鬥，我也無感覺。此種感思與詮釋或與季羨林研究佛教史領域有密切的關係，內在知識的建構，使他能在苦痛當下置換角度去思考，例如：他在書中緣起中寫道：「我懷疑，造牛棚的小將中有跟我學習佛教的學生。我懷疑，他們不但學習了佛教史和佛教教養，也學習了地獄學。」⁶⁶

《牛棚雜憶》⁶⁷是為季羨林的回憶錄，亦是自娛娛人，既有諷刺的語氣又不失幽默地看待這長達十年的浩劫。亦發明了他自身親歷文革場域的理論叫「折磨論」，意思就是你能折磨他的身體，但不能折磨他的靈魂，他以自暴自棄反擊造反派對他的迫害。根據蔡明苓的研究成果指出：「季羨林與楊絳皆以文學的手法表現，前者採記敘，後者專用散文，但都在文革回憶中以真實意象樹立典型，藉典型衍生字裡行間的真實，從真實際況擴散出無窮無盡的綿長意味供讀者尋覓。」⁶⁸蔡明苓在分章節過程中也將季羨林之著述劃分為「再現式」的文革記憶敘事，文中也以他者之名隱藏控訴的標題，講述：「季羨林以無關自身的冷靜敘事，或是對他者的待遇投以熱切的關懷，……並迂迴地，婉約地與文革暴力形成強烈的對比。並引用季羨林形容牛棚一名挨鬥者無力參與點名之事。」⁶⁹

本文第二部分，意欲探討「牛棚」在文革時期的歷史意義，與其烙印在當事者心中的痕跡，綜觀以上受難者的遭遇，不難發現，即使當事者已被放出牛棚，但精神上的恢復歷程顛躓而緩慢，使之無法快速銜接上社會脈動，他們歷經長期的霸凌、欺辱、無自尊的踐踏，使而產生了心理疾病。即使身體的傷痛終能癒合，生命內在的重建工作，仍需要一段極其漫長的過程。

⁶⁵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 168。

⁶⁶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 3。

⁶⁷ 季羨林，《牛棚雜憶》。

⁶⁸ 蔡明苓，〈第三章「再現式」文革記憶敘事——季羨林、楊絳〉，《回憶文革：在超越與再現間的選擇視野》（臺北：臺大政治系中國中心，2009 年），頁 104。

⁶⁹ 蔡明苓，〈第三章「再現式」文革記憶敘事——季羨林、楊絳〉，《回憶文革：在超越與再現間的選擇視野》，頁 105。

徵引書目

一、專書

- 季承，《我和父親季羨林》（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
- 季羨林，《牛棚雜憶》（香港：三聯書店，1999年）。
- 季羨林，《春歸燕園》（吉林：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 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臺北：大塊文化，2014年）。
- 馬繼深，《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 陳煥仁，《紅衛兵日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 陶鈍，《一個知識分子的自述》（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
- 楊絳，《幹校六記一及將飲茶等篇》（臺北：時報文化，2006年）。
- 廣州地區軍隊院校協作中共黨史組，《中共黨史學習手冊》，（廣州：廣州中共黨史組，1984年）。
- 蔡明琴，《回憶文革：在超越與再現間的選擇視野》（臺北：臺大政治系中國中心，2009年）。
- 蔡德貴，《東方學人季羨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 鄭謙，《中國：從「文革」走向改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 韓麗明，《牆縫裡的秘密：文革謬事拾遺（上）、（下）》（臺北：釀出版，2014年）。

二、期刊論文

- 王友琴，《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受難總論（下）》，《傳記文學》（第117卷，第3期），頁81-91。
- 季羨林，〈我的心是一面鏡子〉，《東方》（1994年第5期）。
- 彭麗君，《文革中的幽靈：作為「牛鬼蛇神」的知識份子》，《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6年10月號，總第一五七期，頁101-116。

三、專書期刊

- 王友琴，〈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收錄於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集刊（三）》（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6年），頁17-36。

四、其他

- 張允若，〈文革中自殺的部分知識精英名錄〉（2013年6月17日）。資料來源：

「禁聞網」，<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lishi/20130831/661597.html>。引用時間：2024 年 1 月 11 日。

Research on the “Cowsh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of Ji Xianlin

Abstract

This study delves into the phenomenon of the “cowsh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experiences of Ji Xianlin (1911-2009). On May 25, 1966, Nie Yuanzi’s posting of a big-character poster at Peking University, advocating for Marxism-Leninism,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a widespread campaign against the university’s professors, branding them en masse as reactionary academic authorities. Ji Xianlin, initially aligned with the revolutionary faction in Jinggangshan, was later condemned as a rightist for merely possessing a kitchen knife, a box of burnt letters, and a photograph of Chiang Kai-shek and Soong Mei-ling defaced with a red X. These items precipitated his public criticism and humiliation. Spanning from early spring to May 3, 1968, Ji’s ordeal encompassed a harrowing sequence of denunciation, trial, and forced labor. In the thirteenth chapter of his memoir *Random Memories of the Cowshed* Ji detail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wshed by its detainees and provides a meticulous account of the entire denunciation process, the living conditions within the cowshed, and his personal reflections. These narratives occasionally adopt a tone of self-deprecating humor to underscore the absurdity of his suffering and contemplate his near-suicidal despair at the Old Summer Palace, culminating in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towards resilience and a renewed will to live. Despite his eventual release, Ji continued to grapple with the psychological aftermath of his experience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Cowshed Incident” through the lens of Ji Xianlin’s memoirs, augmented by accounts from Ji Cheng, Yang Jiang, Han Liming, and Hao Bin, to investigate the experiences of these intellectual elites during their imprisonment. It seeks to understand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the cowshed, the criteria for detention, and the broader implications for the targeted academic authorities. Furthermore,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study assesses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owsh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valuating its impact on the victims in terms of honor and suffering, through an analysis of oral histories and personal memoirs.

Keywords: Ji Xianlin, Cow Eemons and Snake Spirits, Cultural Revolution, Cowshed, Peking University